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农村金融研究既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核心议题，更是金融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经验总结至关重要。

从全球实践来看，农村金融难题的破解多聚焦于政策性金融主导或合作金融发展两条路径。而中国立足基本国情，探索出以商业金融为主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成功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深度下沉与效能提升。这一实践创新不仅为“三农”事业发展注入了持续金融活水，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发展路径，为全球农村金融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展望》一文，系统梳理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践创新成果，精准凝练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特征与运行规律，尝试构建兼具本土性与系统性的农村金融自主理论叙事体系，为该领域知识体系的自主化建构奠定基础。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普惠金融深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时代内涵、现实逻辑与路径创新》一文，基于我国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的战略背景，深入剖析普惠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机制与实践成效，揭示了中国农村金融以提升弱势群体金融服务为重点的实践创新。《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研究》一文则聚焦文化维度，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探讨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行为的塑造作用，为阐释金融实践中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文化视角。两篇文章从实践创新与文化融合两个关键维度，为推进农村金融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与实践启示。

栏目主持人：何婧

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展望*

张龙耀[1,2]，仇 化[1]

（1.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 210095；2. 江苏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南京 210095）

摘 要：构建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战略的关键理论支撑。文章以“中国问题—中国逻辑—中国实践”为主线，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首先，阐述中国农村金融学的理论基础与文化起源，总结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与经验。其次，系统凝练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使命与挑战。最后，从强化一般规律总结、探索标识性概念、深化理论创新和构建系统知识架构四个方面，展望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向，为中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夯实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农村金融问题贡献中国经验。

关键词：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6)01-0055-11

*项目来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5JTCPY-23NL)；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5SJYB005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乡村振兴与金融创新研究团队”。

作者简介：张龙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通信作者：仇化，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家庭金融。

一、引　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真正的现代化需要挖掘中华优秀农耕文明的制度性遗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①。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本土化创新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农村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中国农村金融学的演进始终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同频共振，是连接国家意志与亿万农户生计的关键纽带。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立足自身实践、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体现。然而，中国农业经济学科长期受到国外经济学的影响，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农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2]，农村金融学同样如此。农村金融学理论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市场环境，其核心假设往往与中国复杂的乡土社会现实存在差异。例如，基于完全市场与个体化决策的经典模型，在解释中国农村以关系网络为基础、深受政策引导的金融行为时，常显得解释力不足；国际上典型的小额信贷模式在融入中国强调基层组织与规模效益的实践时，也经历了深刻的本地化改造过程[3]。通过信贷技术与手段创新，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模式有效缓解了农户正规信贷约束[4]。这充分表明，简单套用外来理论难以全面而精准地解读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村金融变革，甚至可能误导实践。因此，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科发展的紧迫需求与时代发展的内在需要[5]。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背景下，应以自主为导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6]。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内源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经验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认知，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形成的整体[7]。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丰富的现实养料。从历史维度看，中国自古就不乏金融智慧，从早期的赈贷措施到宋代的“青苗法”，再到明清时期遍布乡里的义仓与票号，都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农村资金融通的探索与管理智慧。从当代实践看，中国农村金融走过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其经验的层次丰富性、地域差异性和动态变化性远超一般理论模型的概括范围。无论是农村信用社体系从合作制到商业化的转型，还是政策性金融在支持粮食安全与脱贫攻坚中发挥的支柱作用，抑或当前数字技术跨越“地理鸿沟”将金融服务直达农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实践都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宝贵样本。系统梳理、凝练与升华这种“中国经验”，使之从零散个案上升为系统的“中国理论”，是当前农村金融学界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梳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脉络，其次总结农村金融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实践与经验，再次论述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现实挑战，最后基于时代要求与学科规律，对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路径与可能方向作出展望，以期推动该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为全球农村金融发展和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①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二、中国农村金融学的理论基础与文化起源

（一）中国农村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农村金融学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金融发展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理论等多个理论基础之上，其演进过程体现了对国际理论的批判性吸收与本土化创新的辩证统一。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论框架，曾对我国金融改革产生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利率管制、信贷配给等金融抑制现象会阻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主张通过利率市场化、放宽金融准入和开放资本账户实现金融自由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等教训表明，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推进金融自由化，可能导致利率飙升、热钱大进大出、实体经济受损等严重后果。这些实践中的困境促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理论必须经过深刻的本土化改造才能适用于中国实际。

早期我国农村金融研究主要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如信贷配给、金融深化、金融约束等理论。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指出，由于放贷方难以准确识别借款人的风险水平和投资行为，单纯依靠利率调节无法实现市场出清，反而可能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银行普遍采取信贷配给策略。这一理论为理解农村金融市场失灵提供了重要视角。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初始条件、制度环境等因素上存在差异，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必须建立在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在这一理论反思与重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建立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即将农村金融置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加以考查，而非仅仅关注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理论，揭示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的循环与周转过程，为理解农村金融在资本循环中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深刻洞见。特别是其中关于信用制度与生息资本的理论分析，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内在趋势，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失衡与危机，这一视角对防范农村金融“脱实向虚”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金融承载着服务“三农”发展的特殊使命，其运行逻辑不仅遵循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律，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指出应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农村金融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如何发展”等根本性问题，也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充分体现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伟大实践创新。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金融领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创新探索，从精准扶贫小额信贷到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从政策性农业保险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从村级金融服务站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这些立足中国大地的实践创造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如新质生产力，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

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实践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对农村金融的现实困境、发展路径等问题展开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入探讨。中国在完善金融政策支持、拓展资金投入渠道和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长足发展[8]。金融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逐渐成为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力量[9]。民间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国家级金融改革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促进共同富裕[10]。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益贫式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11]。数字金融具有丰富融资渠道[12]、促进消费[13]的多维度效应。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增强信息关注度、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渠道，数字金融能显著改善农户可持续生计[13]。在农村家庭面临信贷约束或预防性储蓄较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的作用更加突出[14]。这些研究结论在世界其他国家实践中得到相应印证[15-16]。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能通过“比较优势”与“竞争效应”，提升所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立数量，并提高创立过程中的生产技术与自有资金水平[17]。但也有学者关注到，尽管经历了持续的改革探索，中国农村金融仍面临农信机构改制不彻底、基础设施薄弱、风险分担机制滞后等多重瓶颈，制约其向高质量阶段迈进[18]。涉农产业基础薄弱和县域银行业同质化竞争，使得村镇银行发生“使命漂移”，导致有限的金融资源从涉农产业部门流出，进而使农村居民收入减少[19]。在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既存在因金融功能认识不足而导致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不充分的现象，又面临涉农金融政策协同性不足、农村金融服务同质化竞争、融资信息成本约束、抵押担保障碍、市场体系多元化发展滞后、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8, 20]。

这些立足中国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共同构成中国农村金融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有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农村金融学的文化起源

构建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定不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农村金融理论，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学知识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学的知识体系缘起于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深刻理解。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石，其关于义利之辨、信用伦理和财富观念的思想深刻影响农村金融的形态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非简单否定经济利益，而是强调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道义原则。这一思想在实际金融活动中体现为“重义轻利”的信贷文化，使得传统农村信贷在追求经济回报的同时，更注重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孟子“制民之产”的思想，主张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作为生计基础，这为后世建立保障性金融制度提供理论依据。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守望相助、患难相扶”的社区伦理，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传统金融形态，这些实践智慧构成农村金融学的宝贵遗产。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粟贷”，是最早的农产品信贷形式之一。《周礼·地官》记载的“泉府”机构，专门负责“赊贷”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贷款，待收获后偿还，体现国家层面对农村金融的早期探索。这种以实物借贷为主的金融形式，适应当时自然经济的特征，也降低因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北宋时期诞生于四川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发行初衷虽为便利跨区域贸易，但其信用机制和流通模式也对农村金融的货币环境与资金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反映中国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的超前智慧。宋代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则是中国古代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典范。这一制度目的在于“贷谷于民，出息以偿”，既缓解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其蕴含的普惠金融理念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明清时期发展的“社仓”制度则代表民间自发形成的金融互助机制。这些仓储制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丰年储粮、荒年放赈，构建起基层社会的风险抵御体系。开始于明末、鼎盛于清代的山西票号，构建了“汇通天下”的庞大金融网络。虽然主要服务于长途商业贸易，但其建立的跨区域信用体系、缜密的汇兑与资金清算机制，以及基于地缘、血缘的信用管理模式，为农村地区资金跨域融通和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借鉴。

从中国传统金融形态的演进可以看出，农村金融模式深深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之中，依托

宗族组织、民间信仰和乡规民约等基于血缘、地缘的非正式制度保障合约执行，与西方依靠法律强制执行的金融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在当今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传统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金融智慧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可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社会资本能够在数字空间中得到新的体现和强化。传统金融文化中的风险控制智慧、社区治理经验，也为防范现代金融风险、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提供宝贵参考。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学的演进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

三、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总结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金融学的学科发展相互交织、彼此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农村金融改革实践的系统梳理与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经历深刻变革，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与服务模式，建立起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互协调的农村金融体系[21]。总体来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历程大致可分为恢复与重建、初步探索、体系重构、改革创新及高质量发展五个关键阶段。每一阶段的实践探索都为农村金融学的理论发展与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恢复与重建阶段：奠定农村金融基础（1978—1992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与此同时，大批商品的生产经营权放开，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为适应这一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着手恢复并成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格局。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设立，承担支农资金管理和农村信贷职责，并代管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逐步恢复合作制属性，成为基层金融服务的重要力量。1986年，国务院在邮电系统内设置邮政储汇局，负责管理邮政储蓄、汇兑等金融业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储蓄渠道。由此，形成以中国农业银行为核心、合作性金融与邮政储蓄并存的农村金融格局。

在此阶段，农村金融学的学科构建以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为核心议题。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与后期设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构成“三驾马车”，初步构建起自上而下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该阶段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制度构建与资金动员机制，为后续农村金融学的系统化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初步探索阶段：迈向市场化转型（1993—2002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开始确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县及县以下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普遍进行改制，私营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步伐加快。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一系列改革，初步形成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在这一阶段，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始组建与职能调整，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隶属关系，并以合作制为模式进行改革。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1999年，国家全面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整顿农村金融秩序。2000年，江苏省在全国农信系统率先实行体制改革试点， 成立全国首家省级联社——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后续的省级联社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此阶段，农村金融实践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与产品服务创新并进的特征。小额信贷试点、村镇银行设立、“龙头企业+农户+信贷”等模式的出现，推动了农村金融学科研究从制度建构向机制创新拓展。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在信贷契约中的作用、产权抵押的法律与实践突破等议题，农村金融学的研究视野逐步拓宽，初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视角。

（三）体系重构阶段：多元化格局的深化（2003—2009年）

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农村金融改革步入体系重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成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公共财政在农村的作用日益扩大，农村金融存量与增量机构改革深入推进，为建立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创造有利条件。2003年6月，国务院批准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全面开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6年，原银监会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推动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机构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结束“只存不贷”历史；2008—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挂牌上市。至此，中国农村金融领域形成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新格局。

在此过程中，农村金融学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机构治理、市场竞争与风险控制等深层议题。例如，案例研究发现，农信社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公司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及盈利能力均得到一定提升，但支农信贷占比下降，因此应通过有针对性政策设计，推动农商行实现商业可持续性与支农使命的有机兼容[22]。随着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完善，学科建设开始从宏观制度分析向微观机制设计延伸，农村金融学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方法日趋系统化。

（四）改革创新阶段：迈向普惠与现代化（2010—2022年）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对农村金融服务的规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改革创新，以适应新形势。2010年起，农村金融改革进入以普惠与现代化为导向的新阶段。农村信用社全面启动股份制改造，并基本完成向农村商业银行转型的过程。此举旨在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并稳定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提高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2012年，省联社改革逐步推进，浙江等地的农商联合银行模式为体制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本。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农村金融政策聚焦精准扶贫，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等工具广泛运用，有效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与增收脱贫，成为普惠金融在特定阶段的重要实践。2017年开始，大中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普遍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三农”金融事业部，强化对“三农”领域的资源倾斜。在此阶段，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为基本经验，中国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基本形成[23]。数字技术的快速渗透重塑农村金融市场格局，移动支付、数字金融、智慧农险等新型服务模式广泛普及，显著提升农村金融的覆盖面、便利度和运行效率。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农村金融支持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涉农金融在产品、技术和模式方面的创新全面加快。农村金融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农业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交叉领域，呈现出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农村金融学学科建设不仅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和供给机制，而且越来越关注农村金融在城乡融合、农村产业升级、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五）高质量发展阶段：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与服务乡村全面振兴（2023年至今）

进入新时期，国家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农村金融改革步入以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系统提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五篇大文章”框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其列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成为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落脚点，也成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领域。

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不断变化，国内农村金融市场格局不断演变，统筹好农村金融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金融领域的重要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针对中小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问题，2025年以来，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进程加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参与地方

农村商业银行的兼并重组工作。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为农村金融学界未来思考与审视银行业结构演变问题提供新的议题。

现阶段，农村金融学领域学者紧扣理论前沿和政策动态，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农村金融领域的诸多研究议题本质上与金融“五篇大文章”高度契合、相互贯通。具体而言，如何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是科技金融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与绿色金融研究深度契合，缓解农村弱势群体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是普惠金融的战略重心，回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治理挑战是养老金融的发展重点之一，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在效率提升与成本结构方面的系统性优化是数字金融的研究课题。这种多维度的交叉研究不仅体现金融“五篇大文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化，也拓宽了农村金融学的研究视野，为新时期农村金融学科发展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四、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使命与挑战

（一）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使命

1. 坚持理论实践互促，归纳扎根乡土的方法论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学的形成与发展，始终遵循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演进逻辑。其理论体系并非源于抽象推演或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与丰富的区域实践中逐步凝练而成。该学科高度重视对本土经验的系统总结，强调将实践中形成的认知通过理论化提炼与实证检验，最终反哺于新一轮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与市场创新，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良性循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程深刻揭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与地方性知识，充分尊重农村社会的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任何脱离现实情境的制度移植均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在新文科背景下，构建“耕读立根”的实践育人体系，对涉农高校培养金融研究生至关重要。但许多高校存在学生对耕读教育价值认同不足、田间实践机会匮乏等问题，严重制约理论与实践的知行转化[24]。因此，扎根中国大地，从实际问题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构成该学科最突出的方法论特征之一。

2. 坚持交叉学科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

农村金融学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构建超越单一学科的边界，以农林经济管理与金融学为核心，广泛吸取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由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农村金融作为连接现代金融体系与传统乡土社会的桥梁，既遵循一般的金融运行规律，又深刻嵌入特定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这种双重属性决定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全面把握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需要交叉学科理论与方法加以支撑，并由此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研究范式。即从中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问题出发，整合学科理论工具，综合使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随机实地实验、机器学习等学科方法，使农村金融学研究更加贴近现实需求，也更具实践指导价值。

3. 坚持自主知识创新，产生原创性理论成果

推动原创性理论的诞生，成为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学实现学科成熟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使命。这意味着中国农村金融学将不再仅是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而是能够产生原创性理论、为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的知识高地。在发展与构建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需要基于本土的成功实践与独特挑战，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与分析框架。所产生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不仅能用于解释中国现象，也能为解决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难题提供有效方案。

（二）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挑战

1. 数字技术创新冲击下知识与研究范式更新加快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迭代创新，对传统农村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与知识

体系带来重大机遇与挑战。从研究对象来看，数字技术重构了农村金融的服务场景与运作逻辑。移动支付下沉、线上信贷普及、智能风控落地，使得农村金融的参与主体、交易模式、风险特征等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基于线下信贷、熟人社会信用的研究框架，难以解释数字技术催生的新现象，亟须构建适配农村数字金融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研究能力来看，数字技术的普及对研究者提出跨学科的复合能力要求。农村金融学研究者不仅要精通金融理论、农业经济规律与农村社会学，还需掌握数据采集与清洗、算法模型构建、机器学习应用等数据科学技能。当前，国内农村金融研究领域仍以传统经济学、金融学背景学者为主，多数研究者缺乏系统的数字技术训练，面对海量农村金融交易数据、农户行为轨迹数据时，普遍存在“数据不会用、模型不会建、结论难落地”的困境。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知识更新周期大幅缩短，部分刚形成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很快便因技术升级而失效，进一步加剧知识储备与研究训练的压力，导致学科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且具有前瞻性的核心内容。

2. 知识转化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通道有待畅通

农村金融领域的实践创新始终走在理论研究前沿，而田野中涌现的大量鲜活、有效的基层创新与实践智慧多数停留在现象总结、案例描述的表层阶段，未能被及时提炼并概念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理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基于资源禀赋、社会结构、产业特征形成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创新模式，如“三位一体”农村合作金融模式、“党建+信用村”建设。这些实践创新蕴含深刻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创新做法的罗列与成效的简单评估，缺乏对其背后“中国情境下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农村金融中的协同机制”等深层问题的挖掘，未能将实践经验升华为具有理论高度与普遍解释力的概念、范畴与模型，导致实践智慧难以转化为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

同时，理论研究成果向政策与实践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一方面，部分理论研究脱离农村金融的现实情境，过于追求模型与数据分析，忽视农村金融的复杂性、多样性与特殊性，研究结论缺乏可操作性，难以直接为政策制定与金融实践提供指导；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与金融机构从业者对理论研究成果的关注度与应用意愿不足，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接机制。理论研究成果多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形式呈现，未能转化为政策制定者易于理解、便于操作的政策建议，也未能形成金融机构可直接应用的业务模式与产品方案，导致学科知识体系难以通过实践反馈实现自我迭代，影响学科的生命力与实践价值。

此外，农村金融学研究呈现实践创新碎片化与理论研究分散化局面，基层创新多为自发探索，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整合；理论研究多聚焦单一领域或者单一案例，缺乏跨区域、跨类型的比较研究，难以形成具有全局视野的理论成果。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知识转化的难度。

3. 原创理论的国际传播效果与话语影响力有待提升

尽管我国在农村普惠金融、农村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形成一批具有本土化优势的原创理论，但这些成果的国际能见度与认可度依然有限，未能充分发挥为世界处于相似情境的国家提供“中国方案”的作用。

从传播渠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学原创理论的国际传播过度依赖国际英文期刊等传统渠道，这些渠道的话语权长期被西方主流学术体系主导，对非西方情境的理论成果存在天然的认知偏差与接受门槛。同时，国内缺乏专门的国际传播平台与专业的传播团队，原创理论的传播多依赖学者个人的学术交流，缺乏系统性、规模化的传播策划，导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成果“藏在深闺人未识”。

从话语体系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学原创理论多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情境，形成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如“普惠金融下沉”等，但这些概念未能被准确翻译成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话语表

达，也缺乏与西方主流理论的对话与衔接。部分理论成果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因缺乏对中国制度背景、农村社会结构的清晰阐释，导致国外学者难以理解其核心内涵与适用边界，难以融入全球普惠金融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讨论。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占据全球学术话语权，形成“西方标准”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我国农村金融学原创理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往往面临“失语”困境，难以获得充分认可。

从传播内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学原创理论的国际传播多侧重于成果的单向输出，缺乏与国际学界的双向互动与深度交流。未能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境对原创理论进行适应性阐释与本土化转化，导致“中国方案”的普适性与可操作性无法得到充分证明，难以真正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金融难题提供有效借鉴，限制我国农村金融学在全球学术领域的话语影响力。

五、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路径与展望

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一次扎根本土、贯通古今、链接中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其核心要义在于，既立足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熟人社会的文化基因与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提炼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原创理论，又遵循国际学术通识范式，将中国实践经验转化为可被全球理解、借鉴的知识成果，具备“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双重属性。

（一）强化一般规律

构建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发展路径之一是强化一般规律的总结，实现本土经验的国际化表达与国际理论的本土化适配。不仅要揭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也要论证包含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其实质是运用国际通识的学术范式与话语体系，科学讲述中国故事的深层逻辑与普遍价值，从而构建一个既能扎根中国大地，又能与全球学术领域进行有效对话和思想交流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不能仅局限于描述与解释中国独特的农村金融现象，而应将源于中国实践的具体经验进行抽象化与一般化处理。例如，系统总结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扶贫小额信贷等领域的成功模式，将其总结为普适性的知识框架和可操作的政策工具，为“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最终，中国农村金融的理论成果既能阐释自身实践，又能为世界处于相似情境的国家提供经验，真正承担起“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使命。

（二）探索标识性概念

概念是判别知识体系有无的重要标识，也是理论建构的最小单位[25]。标识性概念是理解中国特色农村金融发展的底层逻辑和现实根基，此类概念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源于对中国独特实践的系统性总结。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实践中，产生了诸如“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花钱买机制’”“普惠金融‘不可能三角’”“数字金融‘金融拓荒’和‘垫脚石效应’”“农业保险+期货”“金融精准扶贫”等标识性概念，总结出“‘四位一体’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普惠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农村金融改革的系统观念与微观机制结合”“政策性与商业性协同的双轮驱动模式”“中国特色的农村数字金融普惠逻辑”“农村金融局部创新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等原创性理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发现“典型事实”，也要准确描述“典型事实”[26]。因此，对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的探索将充分显示中国农村金融学的自主性与解释力，是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与未来方向。

（三）立足理论创新

知识体系“主体性”与“原创性”的根本在于理论思维的“主体性”与“原创性”，要追求知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7]。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性，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积淀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践历程。因此，构建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需深入挖掘这些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价值，将“互助共济”的文化基因与现代金融的风险控制、资源配置理念相结合，提炼理论概念，打破“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单一框架；另一方面需深入挖掘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实践经

验，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演进历程。通过根本性理论总结与创新，构建一个能准确刻画中国农民金融行为和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逻辑、科学解释政府与市场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复杂互动关系的多元理论范式。

（四）构建知识体系

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并非闭门造车的孤立创新，而是用国际通识的范式讲好中国故事。在坚守本土立场、立足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构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零散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方案，其核心特征在于打造系统的知识体系，即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明确的基本原理、统一的研究方法与清晰的逻辑脉络。在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要明确基础理论、研究要素、研究方法等内容。基础理论需要界定农村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核心范畴与本质特征；研究要素主要为农村金融参与主体、农村信用体系、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监管政策等，并阐述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与运行机制；研究方法强调方法论上的融合与创新，综合阐述理论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方法、案例分析、实地调查调研、随机实地实验等方法在农村金融学中的应用。

总之，构建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农村金融学领域学者的普遍共识与共同使命。本文仅是对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初步探索，旨在引发学界对此议题的关注与重视，并继续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进而能够不断提供边际贡献，共同推动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持续完善。

致谢：

2025年8月22—24日，第十九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举办，会议期间何广文、马九杰、熊德平、孙同全、冯兴元、罗剑朝、李明贤、周月书、张正平、刘西川、王修华、石宝峰、何婧、董翀、王小华、黄倩、冯林等多位学者在“中国农村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圆桌论坛”等环节贡献了诸多意见和建议，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 罗必良. 农业制度性基因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兼论农业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10): 3-24.

[2] 司伟, 王秀清. 外察内审: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科回顾与展望[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2(5): 22-31.

[3] 熊德平. 农村小额信贷: 模式、经验与启示[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2): 39-43.

[4] 程恩江, 刘西川. 小额信贷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了吗?——来自三个非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区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10(12): 190-206.

[5] 张东刚.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5): 90-104+206.

[6] 高培勇, 魏后凯, 何秀荣, 等. 加快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11): 2-22.

[7] 郁建兴, 黄飚.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J]. 政治学研究, 2023(3): 14-24+167-168.

[8] 何婧, 丁鑫. 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 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J]. 世界农业, 2025(6): 106-117.

[9] 何广文, 成琳.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J]. 农村金融研究, 2025(3): 3-11.

[10] 温涛, 刘正桃, 何茜. 金融改革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25(6): 4-24.

[11] 张龙耀, 李渊, 郜栋玺. 提低扩中: 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J]. 金融研究, 2025(5): 21-38.

[12] 傅秋子, 黄益平. 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8(11): 68-84.

[13] 王小华, 马小珂, 何茜. 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1): 21-39.

[14] 黄倩, 刘泽慧, 熊德平. 数字金融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 改革, 2024(8): 98-118.

[15] Carter R M, Tjernström E, Toledo P. Heterogeneous impact dynamics of a rural business development program in Nicaragu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9, 138: 77-98.

[16] Cowling M, Brown R, Liu W, et al. Getting money in the country: Is there a liability of rurality facing SM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5, 120: 103886.

[17] 王修华, 彭德荣.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能否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J]. 农业技术经济, 2025(1): 23-42.

[18] 张正平, 董晶. 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9): 81-95.

[19] 杨晨, 朱佳, 马九杰. 小银行发挥优势了吗: 村镇银行设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财贸经济, 2024, 45(12): 72-88.

[20] 王小华, 杨玉琪, 程露. 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问题与解决方案[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7(6): 41-50+257-258.

[21] 谢平, 刘海二.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 南方金融, 2019(3): 3-11.

[22] 刘锡良, 刘利红, 刘海二. 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绩效评价: 农商行案例分析[J]. 财经科学, 2013(8): 28-38.

[23] 徐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 经济研究, 2018, 53(7): 4-20.

[24] 张龙耀, 张娆, 彭澎. 新文科背景下涉农金融研究生“耕读立根”实践育人体系探索——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J]. 中国农业教育, 2025, 26(3): 71-78.

[25] 翟学伟. 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本土概念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5(3): 72-82+158-159.

[26] 刘伟. 以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J]. 经济纵横, 2025(9): 22-30.

[27] 朱雪微. 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思维方式[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10): 66-76.

（责任编辑：胡英彬）

A Construc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Rural Finance

ZHANG Longyao[1,2], QIU Hua[1]

(1.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Jiangsu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rural finance knowledg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eveloping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provides essent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hina issues—China logic—China practic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uch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The paper first delineat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ultural roots that shape rural finance in China and reviews its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accumulated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then it identifies the key objectives and challenges involved in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rural finance.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potential future development, regarding four dimensions: identifying common patterns, formulating core concepts,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constructing a coher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stronger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in China and contribute a Chinese perspective for global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istinctive concepts; China's experience